

湖州藏书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王增清

摘要 湖州地区藏书事业从南朝沈约开浙江藏书风气之先,到清末刘承干殿私家藏书之后,前后历1500多年,成就辉煌。湖州地区藏书家以其高品位的藏书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关键词 湖州藏书家 私家藏书 中国文化史 地位 影响

开浙江收聚之先 殿私家藏书之后

湖州素称“文物之邦”,其中绵延不绝而且功勋卓著的藏书事业为这一美誉增添了重彩一笔。就客观条件而言,只有在印刷术发明并得到普及,图书能大量生产后,才有可能形成一定规模的个人收藏。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私家藏书高潮出现在宋代。然而,早在南北朝时期,湖州的沈约就有藏书二万卷,“京师莫比”,是浙江最大的藏书家,“也是南朝中国藏书第一大家”^①。及至宋代,“印售之书既伙,藏之者亦因之而众”^②。随着宋室南渡,闽浙两地私家藏书渐盛,其中湖州又是藏书繁富地区之一,安吉陈振孙藏书达五万余卷,数量之多,盖过南宋初的秘书省之藏。南宋末年的周密,自称“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③,亦堪称当时全国藏书家之冠。有元一代,湖州藏书事业不显,但赵孟頫自叙“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可知赵孟頫也有不少藏书,只不过由于赵以书画名世而使其藏书不彰。我国的私家藏书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期,江浙两省更是藏书集中地区,从数量上看,湖州又是浙江省位居前列的地区之一,而且有不少大家在全国都是有地位和影响的。明嘉靖间,茅坤的“白华楼”有数十间之多,藏书之富“至于充栋不能容”,据《湖录》记载,白华楼藏书在当时号称甲于海内。与茅坤同时还有一座“玩易楼”,楼主是沈节甫,在嘉隆年间,玩易楼曾与“天一阁”、“天籁阁”、“白华楼”著称于浙江。乾嘉以降,湖州的藏书事业更趋辉煌,刘桐的“眠琴山馆”,严元照的“芳茶堂”,许宗彦的“鉴止水斋”名扬江南,尤其是晚清陆心源的“皕宋楼”,以收取宋版书之多、价值之高而被列为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到清末民初,在古镇南浔相继崛起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适园”、刘承干的“嘉业堂”三座藏书名楼,在一个小镇上出现这种文化现象在全国也不多见。蜚声中外的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于1924年,可称是中国私人藏书史上最后一座藏书楼了,它为湖州地区辉煌的藏书事业作了漂亮的总结。从南朝沈约开浙江藏书风气之先,到清末刘承干殿私家藏书之后,前后历1500多年,足以证明湖州悠久的文化传统。

多方面的成就 全国性的影响

祖国的文化遗产有赖藏书家的悉心收藏和保护才得以流传百世,藏书家的这一功绩不可

抹杀,但如果只限于收藏而不利用,其文献价值就发挥不出来,一旦遇到国难家故,还会造成巨大损失,这种现象在藏书史上也不乏其例,但由此而责怪藏书家也有失公允,因为造成藏书损毁和散佚往往是不得已的,而不是藏主的初衷和本意。然而,如果能充分利用藏书,让其产生新的成果,进一步发扬光大文化和学术传统,则更值得肯定和赞誉,在湖州的藏书家中正有一批学识渊博的人物为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择要数列,以资佐证:

时代	藏书家	成果与评价
南朝	沈约	创“四声八病”之说和“永明体”,著《宋书》、《晋书》、《齐纪》等。 “他博通群籍,藏书达二万卷,有关于文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的专著。”(蔡尚书《中国文化史要论》)
南宋	陈振孙	藏书五万余卷,著《直斋书录解题》。 《直斋书录解题》“不仅创为解题一体,而其内容亦涉及甚广。”(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 “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诚考证之所必资也。”(《四库提要》)
南宋	周密	藏书四万二千余卷,度置“书种”,“志雅”两堂,著《草窗韵语》、《草窗词》、《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 “宋元之际衍姜夔一派的,就推周密及年辈稍后的张炎为巨子”(吴熊和《唐宋词通论》)。 《武林旧事》“是书乃于其入元后,追忆杭州都城旧事而作……征武林掌故者,多于斯取材”(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
明代	茅坤	明代著名文学家,“唐宋派”古文大家之一,“白华楼”藏书在当时号称甲于海内。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史记钞》,著有《茅鹿门先生文集》等。 《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
明代	臧懋循	“家藏杂剧,多秘本”,选编《元曲选》。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保存和流传元曲有重要贡献的人,他就是《元曲选》的编纂者臧懋循”(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清代	严可均	藏书二万卷,著有《说文声类》、《说文校议》、《铁桥漫稿》等,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严可均是清代的考据学家、校勘学家,一生所著书和所辑书,积稿等身,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

时代	藏书家	成果与评价
清代	陆心源	藏书十五万卷以上,“素缙缃帙,部居类汇,遂为江南之望”,有宋刊本二百种名“百宋楼”,为晚清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陆心源不仅为藏书家,还是一位学者,编著有《仪顾堂文集》……总称为《潜园总集》共九百四十种,他所刊刻的《湖州丛书》《十万卷楼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有一定影响。”(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清代	刘承干	清末民初的“嘉业堂”可与宁波“天一阁”交相辉映,鼎盛时期藏书达五十七万余卷。刊《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等共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所致孤秘,枣梨以引,于是老儒之占毕,介士之孤愤,系一线于不坠,主人之功尤不可没也”(胡道静)。 “刘承干作为近代的藏书家和出版家,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我们所认识。”(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以上择要选取的几位湖州藏书家在文化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所处的地位,决不只是局限于湖州地区之内,而是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如陆心源之“百宋楼”,虽号称两百种宋本而非为实数,但其所藏确有不少堪称精品,如蜀大字本《左传》、残蜀大字本《汉书》及《后汉书》、宋耿秉本《史记》、宋一经堂本《后汉书》、淳祐湖州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等在当时已属罕见,更有宋汴刻本《说文解字》等书系海内孤本。陆氏后人动议出售藏书时,著名文化人张元济曾想悉数收购,但当他筹资十万赶赴湖州时已被日本岩崎氏先人一步船载东去,此事引起全国学术界震惊,张元济、鲁迅、缪荃孙等为之顿足扼腕。张元济先生为宏扬中国文化,二十年后又赶赴日本静嘉堂文库,将百宋楼的部分珍善本照相制版,在《四部丛刊》等书中影印面世。百宋楼的变故是湖州乃至中国文化的幸,但也反映了它以其不凡的版本价值所确立的著名藏书楼地位。

应该说明,有的藏书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还不只所举之例,如旧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校勘《明实录》过程中,曾访得嘉业堂收藏的宁波“抱经楼”抄本,补辑和纠正了底本的缺佚与错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皇皇巨著《明实录》校印本,其中就有嘉业堂的一份功劳。由于文章篇幅所限,诸如此类,不能悉数尽列。还应该说明,有作为的藏书家还不止上列几位,有些人物如明代凌濛初、清代俞樾等,由于他们各以版刻、文学等成就名世,而不以藏书家列,据有关专家推论,他们也应当富有藏书。我们仅从藏书家这个角度来看湖州人物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就足以令今天的湖州人引以为自豪的。

总结历史经验 光大文化传统

我们对历史的总结和研究当然不是为了炫耀光辉的昨天,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去创造更加灿烂的今天和明天,那么,我们可以从湖州藏书家的业绩中得到什么历史经验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私家藏书的兴盛与湖州地区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密切相关。史家认为,从三国吴到

南朝,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赶上或超过中原地区。永嘉南渡使文化重点由北方向东南转移,及至宋室迁都临安后,江浙更成为经济文化繁富地区。明代中叶以降,湖州已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最先出现的地区之一,这一切都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就个人条件而言,藏书活动要以一定的家庭资财作保证。纵观湖州地区的藏书家,多数是非官即商,由家境优裕而收藏图书。如沈约、叶梦得等曾官居高位,而近代蒋汝藻、张均衡和刘承干等都为南浔巨富。正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域环境和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为湖州地区藏书和人才优势创造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二、藏书家中的高水平人才、高层次交往使藏书得以有效利用并产生新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数以千计,但能够在某些领域作出显著成就者却不在多数。因为有的人藏书并不是为了做学问,他们虽以版本或数量相标榜,但只是装点门面、徒饱蠹虫而已。笔者曾将藏书家中有某种作为而列入历史名人的人物作过一个统计,其数量只占5%左右^④。可见,只有会读书的人才真正懂得收藏、懂得利用,也才能产生新的成果。本文所列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藏书家中,大多为举人、进士出身,沈约、陈振孙、臧懋循等曾任国子司业、祭酒或博士,陈振孙、严可均等曾为县、府学教谕,这些职位都是需要有渊博知识和学术地位的人充当的。他们在学术领域能取得显赫的成就,除了自身有深厚的学问功底以外,还与他们游历在外,交往广泛,眼界开阔有关。与他们结交的有一批颇有地位和名望的专家学者。如南朝沈约与任昉、王融、萧衍、谢朓等著名学者交游,被称为“竟陵八友”,他与谢朓、王融等人赋诗唱和,创立“永明体”,对近体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又如臧懋循被谪归里后,与戏曲家汤显祖、诗人王世贞相友善,对他鉴别、选编《元曲选》不无关系。再如德清藏书家许宗彦,也是清代经学家,与他交往并切磋学术的有程瑶田、钱大昕、段玉裁、王昶、阮元等,都是一代经学大师,且有丰富藏书。与严可均至交的姚文田、孙星衍也是当时著名学者。清末民初,南浔适园、密韵楼和嘉业堂不仅为湖州藏书事业添写了光彩的最后一页,而且还吸引了一批学界名流,在此校勘图书、编撰书目、交流学术,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为蒋汝藻编撰了《密韵楼藏书志》,著名版本目录学专家叶昌炽、缪荃孙为张均衡编校著录善本书960多部,撰成《适园藏书志》,刘承干在选编、刊刻《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等丛书的过程中,先后延请了当时在史学、考古学、金石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领域里如吴昌硕、罗振玉、王国维、况周颐、沈曾植、张元济、缪荃孙、叶昌炽、褚德彝等为其鉴定版本,精校编审,嘉业堂刻书之精为人称道,原因也在于此。这种高层次的学者交往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湖州学者和藏书家本身的学术水平不低;二是湖州藏书确有精品可赏可读,除了个人情感以外,如果没有高品位的图书所吸引,罗振玉、王国维、缪荃孙这样的名家大概是不会专门来南浔为张均衡、蒋汝藻、刘承干编写书目的。湖州藏书家所取得的高水平学术和文化成果,也是同高素质的人才与高品位的藏书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眷眷桑梓之情融入累累乡邦文献。湖州籍的藏书家在外为官或经商者居多,他们的藏书活动有许多是在任上开始的,但当他们离职或退休归居故里后,都在家乡筑楼储书。如南宋陈振孙曾先后在江西、福建和浙江台州、嘉兴等地任职,所到之处,随时留心搜购、抄录图书,“兴化任上回浙后,他已是著名的藏书家了。”^⑤又如明代茅坤先任青阳、丹徒知县,后擢升礼部、吏部主事,大名副使,因故归里后,在练市筑“白华楼”达数十间,成为当时江南名楼。晚清刘承干的藏书是依仗丰富家财在上海搜集的,积十年之久,购得大量书籍以至于在上海的家中

已不能容纳,于是在南浔故居旁建“嘉业堂”藏书楼,这座占地二十亩,斥资十二万,历时五年建成的藏书楼,其建筑规模和形式,在私家藏书楼中很有代表性,它和宁波天一阁南北对峙,成为至今保存完好的两颗图书馆文化的明珠。

湖州藏书家以眷眷桑梓之情融入家乡的文化建设之中,他们不仅为各个时期的文人学士保存和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有不少学者型藏书家利用自己或别人的藏书在不同领域里取得了重要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湖州赢得了声誉,而且还有一些藏书家为搜集和流布乡邦文献作出了贡献。早在南宋期间,陈振孙因不满意嘉泰《吴兴志》,而于淳祐九年另撰《吴兴志》,据同治《湖州府志》著录,他还纂辑了《吴兴人物志》,可惜因年代久远,两志都没有留传下来。在存世地方志中,由藏书家参与编修的尚有郑元庆所作的《石柱记笺释》,《四库总目提要》称“其征据考证,颇为贍博”,为乾隆朝修志者取资。郑元庆更为用力编修的地方志是《湖录》,因没有及时刊行,今仅存“经籍考”部分。湖州地方志中体例严谨,材料详备,常被今人查考的是清同治本《湖州府志》,南宋楼主陆心源是此志的主纂人之一,陆心源主纂的湖州方志还有光绪七年(1881)编修的《归安县志》等。作为一代信史的地方志,记载了一定时期的历史面貌,历代方志构成了一个地方真实的历史长卷,为后人总结借鉴前人经验或教训留下了文献依据。湖州藏书家的另一大善举是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藏书优势,搜集、刊刻了一批地方文献,较为著名的有陆心源的《湖州丛书》、《十万卷楼丛书》、《吴兴诗存》、《吴兴金石记》;张均衡刊刻印的《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刘承干刻印的《吴兴丛书》、《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其中《适园丛书》、《吴兴丛书》、《嘉业堂丛书》进入 80 年代后,还被广陵古籍刻印社再次重印,流布全国。这些地方志乘和地方文献不仅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为我们考察总结湖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湖州学者和藏书家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随着时代的变迁,私家藏书已被公共图书馆所替代,馆藏文献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为公众所有,获取和利用文献信息比旧时代更为方便。本文简要总结湖州地区藏书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目的在于:一是希望当代的读书人能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攀登时代的新高;二是希望图书馆工作者继续破除藏书楼的旧观念,用现代的意识、现代的技术和现代的服务水平去塑造现代图书馆的新形象,同时也要利用身在“书城”的优势,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为我国的学术和文献宝库增添新成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

注释:

- ①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略》,载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②③⑤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④王增清:《藏书楼、图书馆与江浙人才》,载《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

作者单位:王增清,浙江湖州师专图书馆,313000